

卡尔梅克史

评注

〔法〕伯希和著
耿昇译



法国西域敦煌学名著译丛

中华书局

• 法国西域敦煌学名著译丛 •

卡尔梅克史评注

〔法〕伯希和著

耿昇译

中 华 书 局

NOTES CRITIQUES D'HISTOIRE

KALMOUKE

(OEUVRES POSTUMES DE PAUL

PELLIOT <6>)

PAUL PELLIOT

LIBRAIRIE D'AMÉRIQUE ET D'ORIENT

Paris 1960

责任编辑 柴剑虹

法国西域敦煌学名著译丛

卡尔梅克史评注

〔法〕伯希和 著

耿昇 译

中 华 书 局 出 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 36 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北京新兴胶印厂印刷

850×1168 毫米 1/32·7 1/4 印张·157 千字

1994 年 5 月第 1 版 1994 年 5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数:1—2500 册 定价:16.00 元

ISBN 7—101—01192—6/K·500

《法国西域敦煌学名著译丛》前言

法国学术界,对中国,尤其是中国西部地区的研究,开始得很早。与当年的世界政治形势密切相关,在十八世纪中叶,就有耶稣会士及少数学者开始了这一事业,注意介绍中国历史、民族史、佛教文化史等。自此以后,可以说是代有人出。进入十九世纪,作为研究汉学的一个基地,1914年,在法兰西学院开设了“中国学讲座”。雷慕沙(Abel Rémusat)、儒莲(Stanislas Julien)、德理文(H. de Saint-Denys)、沙畹(Edouard Chavannes)这些汉学名家都曾是它的主持人,在他们的研究中,西域的民族、历史、宗教是注意的重点。因沙畹的汉学造诣,斯坦因在新疆考古中所获部分汉文资料就曾委托他进行研究考释,他的《西突厥史料》一书,至今仍是我国历史学界重视的研究成果。

在法国研究汉学的事业中,设在河内的法兰西远东学院也是一个重要基地。沙畹的弟子马伯乐(Henri Maspero)、作为法国在我国西域史研究方面代表人物的伯希和(Paul Pelliot),均曾任职于法兰西远东学院,并从这里出发进入中国进行活动。伯希和1906—1908年在我国西北地区考察中,不仅在新疆巴楚的吐木休克、托库孜萨来,库车的都勒杜尔—阿胡尔、苏巴什进行了发掘,拿走了大量的珍贵文物,而且在敦煌莫高窟,贿买愚昧无知的王道士,打开藏经洞,用数十天之功,对藏经洞内的文书进行详细记录,并捆载其中的精华以去。伯希和以其特有的汉学造诣,多方面的语

言才能,凭借在新疆、甘肃的考察收获,获得了空前的荣誉。法兰西学院为其专设了“中亚语言、历史和考古讲座”。他完成了大量有关中亚史地、语言、民族、宗教的论著。法国成为欧洲的汉学研究中心,是与这一背景有关的。继伯希和以后,列维(Sylvain Levi)、高狄奥(Rebert Edmond Gauthiot)、费琅(Gabriel Ferrand)、格鲁塞(René Grousset)、韩百诗(Louis Hambis)等,也都是在中国西部地区的研究中取得过成就的汉学家。继承着这一传统,不论从欧洲,还是从世界范围看,法国巴黎至今仍然是一个国际上的重要汉学研究中心。

法国学者在中国西部研究中,取得了多方面的成果。他们注译了我国古代典籍,尤其是关系古代少数民族历史的文献资料、高僧行记,向欧洲进行介绍。这种翻译往往运用汉文、蒙古文、突厥文、波斯文、拉丁文及其他古代语言文字资料,进行综合考释,从而具有重要研究价值。在敦煌研究上,法国汉学家也取得了重要成果。伯希和在敦煌期间,对石窟进行了编号,绘制了遗址图,对洞窟作了考察、记录,对窟内题记详细抄录,对壁画彩塑作了断代分析。他拍摄的洞窟壁画、彩塑,编辑出版了《敦煌壁画》六卷,他当年的考察笔记,也已作为《伯希和探险团档案》陆续出版,具有重要资料、研究价值。在“藏经洞”及其他遗址中取走的大量古代文献,也分别由伯希和委托各方面的专家进行了研究,费利奥扎和鲍利负责梵文,拉露负责藏文,贝利负责于阗文,列维等负责龟兹文,高狄奥和邦文尼斯特负责粟特文,哈密顿负责突厥回鹘文,有关成果也已陆续出版。伯希和在敦煌的活动大家一般都有了解,而对伯希和当年在新疆巴楚、库车县的发掘,了解却不甚多。在吐木休克、苏巴什、都勒杜尔—阿胡尔等处遗址中的出土文物,大都收存在吉美博物馆,文书资料收存在巴黎图书馆的东方手卷部,工作报告也已陆续

出版问世。这些重要资料,无疑都是我们研究中亚、新疆、敦煌等不可或缺的第一手材料,对今天的研究都有价值,是不能忽视的。当然,在当代法国汉学家中,也出现并还在完成着一些有价值的研究成果,应引起我们的注意。附带还说一句,法国科研中心 315 研究组和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近十年中也一直进行着有意义的合作。目前,经中国政府批准,正在克里雅河流域进行全面的考古调查及发掘,并已取得了虽是初步的、但却是很有价值的成果。这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坚持平等互利原则,两国学者之间的科学合作,也可以说是中法两国学者在中亚研究的事业中正在展开的全新的一页。

能看到法文原版著作不易,即是有幸得到,对大多数人来说,也还存在一个文字上的困难,因此,向中国学术界陆续介绍法国学者过去在新疆、甘肃等地的考古、历史、民族、宗教、语言等诸多领域研究成果的想法,萌发是很早的。张广达教授曾十分热情地支持这一设想,法国朋友也对这一计划给予肯定,希望有可能陆续将有关重要资料、研究译成中文出版。这一丛书的问世,可以说是中法两国学者友谊的结晶。但限于编者的学识、经验,在决定选题、组织翻译等环节中,尚欠缺更完善的计划。目前奉献在读者面前的,是计划原则确定、出版经费落实之后,选定的第一批著作。在翻译、出版中,得到了有关法国学者、出版社以及法国驻华使馆文化处的积极支持。曾主持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宣传工作的冯大真先生也给予了关心。对此,我们表示衷心的感谢。它们的出版,对我们了解法国学者在有关研究领域的新成果是有积极意义的。

在今后进一步的翻译、出版工作中,我们希望得到有关学术界同仁的支持、帮助,也希望听到批评、建议,以便改进工作。

王炳华 1992.11 于乌鲁木齐

译 者 的 话

《卡尔梅克史评注》是本世纪上半叶法国的中国学泰斗伯希和(Paul Pelliot, 1878—1945年)的7卷遗作之一。伯希和从本世纪20年代开始写作本书,不断地修改补充,使之臻于完善,花费了20多年的心血,直到他逝世时也未能最终定稿面世。伯希和死后,由他的弟子和事业的继承人韩百诗(Louis Hambis, 1906—1978年)整理后于1960年在巴黎由美洲和东方书店出版。这是一部研究西蒙古史,尤其是蒙古土尔扈特部回归祖国历史的重要著作,颇受国际蒙古学界,尤其是研究西蒙古史学者们的重视,成了本学科中的一部必备参考书。

伯希和于1878年诞生于巴黎,1945年因患癌症逝世。他从1899年进入当时设在越南(先在西贡,后迁至河内)的法兰西远东学院起,便开始他终生矢志不渝的中国学和东方学研究。他曾于1900—1908年间多次赴中国考察,获得了大量的中国古籍和文物资料,特别是从敦煌千佛洞与新疆运走了大量文书卷子、绘画以及其它珍贵文物。他回国后曾先后在法兰西远东学院和法兰西学院任中国学教授,此外还曾任法国亚细亚学会会长,主编当时的东方学杂志《通报》(现已改版为国际汉学杂志)。他从1931年起被选为法国金石和美文学科学院的院士。伯希和一生中的中国学著作特别丰富,专长于治中外关系史、西域南海史地考证、对汉文古籍的考证及中亚古文字的释读和研究。他是世界上少有的几个几乎

涉足到中国学乃至整个东方学界各领域的名噪一时的学者之一，甚至被称为“超级东方学家”；其著作大都被西方的中国学家和东方学家们奉为权威。他是法国中国学研究全盛时期的代表人物，也是法国东方学的一代宗师。

蒙古史(尤其是西蒙古史)是伯希和终生迷恋的重点研究项目之一。他生前除了发表一系列的论文之外,主要专著有1923年发表的《蒙古和教廷》。他有关西蒙古的主要专著大都是在他死后由韩百诗主持刊行的。主要作品有:与韩百诗联合署名的《〈圣武亲征录〉译注》(1951年),令人遗憾的是本书仅出了第1卷;《蒙古秘史》(1949年),是他根据汉文注音本而复原的蒙文本;《金帐汗国史札记》(1953年),是他针对当时苏联格列科夫和雅库鲍夫斯基所著的《金帐汗国兴衰史》一书而作的札记;《中亚和远东基督教研究》上卷(1973年),是对他柏朗嘉宾(Jean de Plan Carpin)和鲁布鲁克(Guillaume de Rubrouck)出使蒙古、摩诃·雅巴阿罗河和拉班·扫玛赴西方旅行纪的札记。其下卷(1986年)是对大秦景教碑汉文和古叙利亚文碑文的释读与考证研究;《马可·波罗游记》(1938年与穆尔合作)是一部对该游记的权威译本。他此后又一直不停地钻研马可·波罗游记,写成了《马可·波罗游记注释》一书,分别于1959、1963和1973年作为其遗作分3卷出版;《〈真腊风土记〉译注》(1951年,由戴密微和戈岱司整理)是他对元蒙时代周大观的《真腊风土记》的译注增订本(初版刊行于1902年)。此外就是这本《卡尔梅克史评注》。伯希和是世界上典型的考据派中国学家之一,至今仍有不少法国的汉学家继承了他的这种传统,形成了法国汉学界的一个代表学派。

负责整理出版伯希和本书以及其它遗作与探险团档案的是他的学生和事业的传人韩百诗。韩百诗1906年诞生于法国利古热,

1978年逝世于巴黎。他于1942—1947年任法国国立东方现代语言学院蒙古语教授,于1947—1950年间任巴黎大学北京汉学研究所所长,从1952年起又任法国高等实验学院第4系研究导师,从1956年起主持最早为伯希和设立的法兰西学院中亚历史和文明讲座。他于1959—1973年间又任巴黎大学汉学研究所(该所现已划归法兰西学院)所长。他长期担任法国亚细亚学会副会长,曾出任他亲手创办的法兰西学院亚洲研究所中亚和高地亚洲研究中心主任等职务。韩百诗本人也是法国著名的中亚和蒙古史学家,其著作颇多,其著作目录(共60多种)已由费利奥扎刊布于1979年的《亚细亚学报》中了。

西蒙古土尔扈特部族于17世纪上半叶(1630年左右)西迁俄罗斯伏尔加河下游地区,由于不忍沙皇俄国的压榨,于1771年在他们的民族英雄渥巴锡汗率领下,离开他们已居住了一个多世纪的伏尔加河流域的驻牧地而回归。他们沿途跋涉数千里,历尽苦难,摆脱了俄军的追击和沿途某些部族的围追堵截与劫掠,终于回归祖国。他们的英雄壮举是中国民族史上一曲爱国主义的凯歌,中外各种史料中对这一事件有过不少记载。国内外学者研究这个重大历史事件的著作也屡见不鲜。1919年,英国学者巴德利(John F. Baddeley)出版了两卷本的巨著《俄国·蒙古·中国》(商务印书馆于1981年出版了汉译本),其中涉及到了卡尔梅克人的历史和世系问题。但由于巴德利主要是使用了俄文史料,自己不懂也未曾使用记载翔实的清代汉文史料,因而出现了许多谬误。伯希和正是针对巴德利这部著作而写成了此书,主要是译注了一些汉文史料,对巴德利著作作了补充、校正和发挥。书中的考释非常详尽,广征博引,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尤其是他将蒙古人物、名物、地名等方面的汉文对音字复原为蒙文的考证更为精彩,现已被学术界广泛

采用。

伯希和的原著分上下两卷。上卷是正文、注释和索引,下卷是卡尔梅克人的世系表,共有5幅表:1. 杜尔伯特和准噶尔人世系表。2. 和硕特人世系表。3. 土尔扈特人世系表。4. ①准噶尔辉特部世系表,第1世系。②第2世系表。③青海辉特部世系表。5. ①阿布赖家族世系表。②阿布勒必斯家族世系表。③巴喇克家族世系表。因为这些表相当长,很难排印,而且我国蔡志纯、高文德先生出版的《蒙古世系》等书已经利用了其中的资料,所以我们暂且删去不用。对于原书末的《索引》,我们改作《译名对照表》,这样用处更大一些。

伯希和是典型的欧洲中国学家,他的某些观点难以为我国学术界接受。所以读者对于其中的某些论述应采取具体分析的态度。但他的一些学术性考证(尤其是史地考证),发挥了他在中西文资料和语言学方面的专长,值得向中国学者介绍。

关于伯希和本书中所用的“卡尔梅克人”(Kalmouke)的名称问题,在此略作一些解释。“卡尔梅克”这个名称不见诸中国的史乘,也不符合中国人的习惯用法。这里所说的“卡尔梅克人”明确无误地系指西蒙古的厄鲁特(额鲁特)部。“卡尔梅克”一般是俄国人的通行用法,在前苏联曾形成了一个卡尔梅克自治共和国,地处在阿斯特拉罕、伏尔加格勒和斯塔夫罗波尔一带,他们事实上主要是于17世纪上半叶从我国新疆迁出而又未回归的一支,在那里繁衍发展而成。

对于“卡尔梅克”一词,伯希和在本书中也作了阐述,由于该词的来源和词义曾引起学术界的争议,众说纷纭,莫衷一是,造成过某些混乱,我们有必要于此再说几句。这个词应该有广义和狭义两种解释。就广义而论,是指厄鲁特蒙古,即西蒙古。最早是西亚突

厥语系各民族的人使用这个词称呼西蒙古人,后来俄国向外扩张,直到1704年才初次使用“卡尔梅克”这种名称,这无疑是从突厥人那里借鉴而来的,从此便把厄鲁特蒙古称为卡尔梅克人。由于厄鲁特蒙古人于17—18世纪在新疆、蒙古、西藏以及中亚等地区政治历史舞台上产生过影响,成为西方学者研究的对象,并且用“卡尔梅克人”的名词来研究厄鲁特蒙古人。其狭义是指以土尔扈特部为主的西蒙古部众,或者是说游牧在伏尔加河下游的蒙古人。在本书中,伯希和基本上是使用“卡尔梅克”一词的狭义。因为他论述的中心内容是外迁俄罗斯的厄鲁特人的一支回归祖国的来龙去脉,长途艰难跋涉的过程以及清朝政府对他们的安置等问题。我们在阅读该书中应该注意。虽然伯希和在书名中使用了“卡尔梅克”(清代作“喀尔木克”)一名,但他在全书的行文中却始终使用“厄鲁特”、“额鲁特”、“卫拉特”、“瓦剌”、“喀尔木克”(Qalmuq)和“西蒙古”等名称。究其原因,是因为伯希和仔细而深入地研究了英国学者约·费·巴德利的《俄国·蒙古·中国》一书。该书使用了俄国档案资料来研究卡尔梅克历史。俄国沙皇在16世纪后期开始向外扩张,从17世纪起,便派遣许多人到厄鲁特蒙古各部首领、台吉等管辖地区进行侵略活动,搜集了许多情报,所以在俄国档案中也保留了不少研究厄鲁特蒙古的资料。伯希和则认为这些记载一般都不太完整。他感到汉文资料比较丰富,所以才从1920年起以汉文资料为主体,以西方资料为佐证,广征博引地考证注释,形成这部研究厄鲁特蒙古的专著。了解这一点,我们对于伯希和使用的书名就不会感到那么刺眼和令人不快了。

法国是欧洲研究厄鲁特蒙古最早的国家之一。早在厄鲁特蒙古中的土尔扈特部回归祖国和乾隆帝御制《土尔扈特全部归顺记》时,法国耶稣会教士钱德明(J-J. Marie Amiot, 1718—1793年)便

译成法文在巴黎发表了有关文献,这是首次向西方国家介绍我国土尔扈特部的历史。清朝政府于康熙五十一年(1712)派图理琛出使伏尔加河下游的土尔扈特部,他于康熙五十四年(1715)回到北京。后撰写了《异域录》一书,有满、汉两种文本,法国耶稣会士宋君荣(Antoine Gaubil, 1689 — 1759 年)根据满文本译成法文,1729年在巴黎出版。法国加斯东·加恩(Gaston Cahen)所著《彼得大帝时期的俄中关系史》一书中也叙述了厄鲁特蒙古的历史。法国的莫里斯·古兰(Maurice Courant)的《17 — 18 世纪的中亚喀尔木克帝国》于 1912 年在里昂—巴黎出版。伯希和充分利用了法国学者们的研究成果,又吸收了其他西方资料,不仅作了大量注释,还编制出了卡尔梅克人的世系表,补充和纠正了巴德利书,使读者对于厄鲁特回归中国的历史有了更全面的了解。

本书是译者在多方面的帮助下才译成汉文和刊行面世的。当我于 1983 年读到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巴德利《俄国·蒙古·中国》一书后,深感更应将伯希和此书译成中文,故于 1983 年底译完了全书。在翻译过程中,得到了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所蔡志纯先生的大力帮助,承蒙《法国西域敦煌学名著译丛》主编和中华书局领导的美意,将本译著列入丛书之中。本书责任编辑又认真细致地作了加工润色,从而避免了许多纰漏。值此书出版之际,谨于此一并致谢!

由于译者水平所限,再加上此书翻译难度极大,所以不妥之处恐在所难免,衷心欢迎广大读者不吝批评指正。

耿昇 1993 年春节

致 读 者

本书是作为伯希和(Paul Pelliot)的遗作而发表的,它事实上是对由巴德利(John F. Baddeley)所发表的论述 1602—1676 年间的俄国人、蒙古人和中国汉人之间关系的巨著《俄国·蒙古·中国》的书评札记。伯希和认为最好是从中再补充一些有关卡尔梅克人的汉籍译文,以对巴德利先生企图复原卡尔梅克人历史及其王公世系的打算提供佐证。巴德利先生由于无法接触汉籍史料,所以他的这种尝试未能如愿以偿。

伯希和完整地翻译了以下主要汉文文献:

一、乾隆钦定《准噶尔全部纪略》;

二、《青海厄鲁特部总传》,载《钦定外藩蒙古回部王公表传》。

三、17 世纪初复兴卡尔梅克人势力的巴图尔珲台吉(Bātur Khontaiji)的世系,引自同一部著作。

四、《土尔扈特总传》,引自同一部著作。

五、《土尔扈特投诚纪略》,摘引自满族人七十一所著《西域闻见录》。

六、哈萨克部传,原载《新疆识略》,其序作于 1821 年。

其中有些文献过去曾有人摘译过片断,但常常被人曲解。所以这些新译文可以使伯希和对由卡尔梅克史所提出的诸问题作出部分的研究,而卡尔梅克史中又经常充满着模棱两可和互相矛盾之处,其原因是由于卡尔梅克人的游牧地远离作者们所生活的大型

文明中心,因而后者缺乏资料;特别是因为卡尔梅克人自己没有留下有关他们古老历史的任何书面文献。

本书初撰于 1920 年之后不久的年代,正是基于这一原因,书中对突厥文和蒙古文的拼写体系与伯希和在数年之后所采纳的那种体系相当不同。正文后面附有大量注释,笔者本人又补充了某些参考资料以作补阙,但对原文从来未作任何修改。许多有关卡尔梅克人地理学(如耶稣会士们所绘制的舆图)和历史学的重要著作在近 20 年来都相继问世了,所以对于其中的某些注释可以进行补充。此著过去未曾公诸于世,因为伯希和一直在对它继续进行加工。事实上,他从来未曾有机会完成该书的定稿工作,但其译文及已经得出的研究成果的意义(虽然在他个人看来尚不太满足)证明,对于关注这些问题的学者们来说,是足可以减轻他们的许多研究工作了。

1958 年 3 月 20 日

于巴黎

韩百诗(Louis Hambis)

说明:本著的考证性索引系由马莱赫(Meleh)先生所编制,他非常乐意地承担这一既费工时而又辛苦的工作,我们为此而特别表示深切谢意。——
韩百诗

目 录

译者的话	1
致读者	韩百诗 1
卡尔梅克史评注	伯希和 1
一 卡尔梅克人名称考	18
二 《准噶尔全部纪略》(摘译和注释)	53
三 17 世纪初之前的准噶尔人	75
四 《青海厄鲁特部总传》(摘译和注释)	88
五 准噶尔巴图尔珲台吉世系	97
六 《土尔扈特部总传》(摘译和注释)	105
七 克烈部和土尔扈特部人	119
八 土尔扈特人于 1771 年从伏尔加河流域的回归	130
九 汉文史籍中的哈萨克人	148
十 哈萨克王公世系	160
附:译名对照表	167

卡尔梅克史评注

由于巴德利先生向我们介绍了至今人们所能找到的唯一的一幅利玛窦(Ricci)全舆图⁽¹⁾,所以已经使我们感激不尽了。他现在又为我们的研究工作做出了新的和更为显著的贡献,发表了关于自1602—1676年之间俄罗斯人、蒙古人和中国汉人之间关系史的《俄国·蒙古·中国》一书,因为1602年是“哥萨克人”对叶尼塞河以远地区发动第一次远征的时间,而1676年则又是沙皇阿列克谢·米哈伊洛维奇(Alexis Mikhaïlovič)的使节尼古拉·斯帕法里·米列斯库(Nicolas Spathar Milescu)逗留于北京的时间。

这部两卷本的装饰精美的对开本著作的书目本身就会使人对其内容有一个梗概性了解⁽²⁾。书中的内容是一些地理学文献和游记故事,基本都是译自俄文,其内容涉及到了中亚和中国北部。其中大量文献已见于俄文载籍,但后者所载一般都不太完整。另外,有关这些史实的著作几乎是不为西欧学者们所熟谙的⁽³⁾。巴德利先生不仅参阅俄文档案中的手稿来发表和翻译文献,还首次发表了(至少是首次公开刊布)一定数量的文献⁽⁴⁾。对于其它许多文献的来源,他又从中得出了一些新的结论。他重新探讨了过去主要是由威斯登(Westen)市长研究过的一些荷兰文文献,此外也重新回顾了雷纳特(Renat)的瑞典文地图。最后,他的注释中也充满着丰

富的史料,而且一般均系引自翔实精辟的史著⁽⁵⁾。

笔者于此不准备在有关莫斯科沙皇与中国皇帝之间古老关系的问题上赘述了。仅仅想指出,继巴托尔德(Barthold)在1913年、波克洛夫斯基(Pokrovski)于1914年之后,巴德利先生的大作(第2卷,第69页以下)又指出的所谓伊凡·彼得洛夫(Ivan Petrov)和雅雷切夫(Yalyčev)使团于1567年赴华一事,绝没有存在的可能。俄罗斯人赴北京的首次旅行发生于近代,即1618—1619年伊凡·佩特林(Ivan Petlin)及其同伴安得烈·蒙多夫(André Mundov)⁽⁶⁾。除了一部在许多方面都一直不太令人满意的游记之外,佩特林介绍了一幅今已失传的蒙文地图和一批信札书函。其一是由蒙古阿勒坦汗(Altan-Khan)所写;其二是万历皇帝所作,后一封信直到1675年才于托博尔斯克在斯帕法里(Spathar)家族的关怀下被勉强解读出来,其原文已失传⁽⁷⁾。佩特林是通过归化城(Bayisih)和大同右卫(Širo-Kalga)⁽⁸⁾而到达北京城的。巴伊科夫(Baikov)使团(1653—1657年)因礼仪问题而告失败,巴伊科夫个人也是通过归化城(又称呼和浩特,Kökō-Khoto之对音)、张家口(Kalgan?)和宣化府(Bayan-Sumu)⁽⁹⁾而抵达北京,未能将其主之御札敬呈中国皇帝便离却返归⁽¹⁰⁾。第一个把广泛的中文资料携回俄罗斯的是斯帕法里使团(1675—1676年)⁽¹¹⁾。当时中国人和俄国人在阿穆尔河流域发生的争端已经开始,在经过多次冲突以后,于1689年成功地签署了尼布楚(涅尔琴斯克,Nertchinsk)条约,它标志着莫斯科人向阿穆尔河流域的扩张在此之后两个多世纪内被迫退却⁽¹²⁾。有关这几次旅行的记载以及由巴德利先生所转载的其它文献本身就是非常惹人注目的,但常常又是含糊不清的,对其许多段落的确切领悟要求进行长期研究和详细讨论。我们感谢巴德利先生使我们掌握了进行这种研究所必需的资料⁽¹³⁾。